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及研究传统

罗雯, 何军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库恩有关科学发展的理论分为五个阶段:前范式阶段;范式的出现;范式完全被接受为“常规科学”;式中出现反常、例外,研究兴趣的下降;范式的瓦解,向新的范式转向。当一个范式瓦解,新的范式又会开始同样的循环过程。借助库恩的科学的发展理论来理解跨文化传播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跨文化传播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到七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上述科学发展的前几个阶段。要使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原则规律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成熟科学的第四阶段似乎目前还很难。当前在中国大陆逐渐发展起来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正遵循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的三种研究传统: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和公平三种研究传统。但跨文化新闻传播要达到成熟科学的第三阶段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新闻传播;民族志传统;民族中心主义;公平问题传统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6)04-0139-04

跨文化传播学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原因是二战后虽然美国享有政治霸权和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在处理与东南亚等国家有关的某些问题时却显得无能为力。Lederer 和 Burdick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书中谈到了美国人的傲慢和他们在理解东南亚人时的无能。而 1959 年爱德华 T. 霍尔 (Edward T. Hall) 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提供了一些有助于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而跨文化传播学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美国人口组成的变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人口组成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变迁产生了畏惧,他们需要对这些更有更好的认识;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跨国公司的发展中面临着开拓事业的迫切需求,他们不希望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时,对环境一无所知;加之 80 年代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使得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并不是什么都做得最好,其它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些都促使跨文化传播学得以发展。

一、从库恩科学发展的理论分析跨文化传播学发展

Dearing 和 Rogers 将库恩的理论中有关科学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前范式阶段;(2)范式的出现;(3)范式完全被接受,成为“常规科学”;(4)范式中出现反常、例外,研究兴趣的下降;(5)范式的瓦解,向新的范式转向。当一个范式瓦解,新的范式又会开始同样的循环过程。借助库恩的科学的发展理论来理解跨文化传播过去的发展,我们就会对

它的未来有更准确的判断。

爱德华 T. 霍尔和 20 世纪 50 年代为培训外交官和其他外事人员的“外事学院”的建立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标志着跨文化传播研究概念框架的形成。施拉姆是传播学集大成者,不同于拉斯维尔、卢因、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施拉姆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霍尔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贡献与施拉姆对于传播学的贡献相似。Hammer 认为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有四点:(1)从关注单一文化到两种文化比较;(2)从文化的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3)将文化同传播过程相联系;(4)让人们注意到文化对行为的影响。同时,霍尔提出了如“一维时间观”、“多维时间观”,“高语境”、“低语境”等我们今天已经广泛使用的概念,为跨文化传播学后继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库恩理论的第二阶段——范式的出现阶段,范式需要被检验、被接受。假设会在应用的过程中得到检验。20 世纪 60 年代为检验这些范式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证研究环境。霍尔的研究成果不仅被应用到外事学院外交官的工作中,而且被应用到对从商人员、移民、国际学生和维和志愿者的培训中。除了国际跨文化互动,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也使美国人自己开始重视本国的文化多样性。同时,人们认识到一些用于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对国内民族间和种族间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

从 70 年代开始,专门的跨文化传播课程、组织和期刊出

作者简介:罗雯(1975—),女,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教研室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何军(1977—),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现了,标志着这个学科第一个范式被人们接纳。1966年,在匹兹堡大学开始有了跨文化传播课程。70年代,跨文化传播课程数目不断增加。到1980年,与跨文化传播有关的本科课程数目达到200,硕士课程数目超过50,博士课程数目超过20。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先驱 John (Jack) Carl Condon 与 Yousef 于1975年合著的《跨文化传播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书,在对 Kluckhohn 和 Strodtbeck 五种文化价值取向(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s)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从人类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和修辞学等方面综合探讨了跨文化传播。此书和 Samovar 和 Porter 于1972年合著的《跨文化传播学读本》(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被认为是70年代跨文化传播研究对80年代综合性研究的贡献。其它的著作还有:Ruhly 于1976年著的《通向跨文化传播》(Orientations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itaram 和 Cogdell 于1976年合著的《跨文化传播基础》(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Dodd 1977年的《跨文化传播视角》(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Prosser 1977年的《跨文化对话》(Cultural Dialogue)。1974年,在美国,一些专业人士建立了一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跨文化跨学科非政府组织——“跨文化教育、培训和研究组织 SIETAR”(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它的发展也反映出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需求。最开始,组织一切的操作都是美国式的,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以美国为基础的组织,而是一个联盟,并且更名为国际 SIETAR。1975年,语言传播协会紧随国际传播协会,建立了自己的跨文化分部。到70年代后期,专业性的期刊和出版物出现了。如:Casmir 编辑的《国际和跨文化传播年鉴》;有关跨文化传播与心理适应的季刊《跨文化关系国际期刊》始于1977年。跨文化传播学在70年代的蓬勃发展使得 Asante 和 Gudykunst 甚至认为70年代才是跨文化传播学真正诞生的年代。

从70年代晚期开始,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一次“身份”危机,面临了“定义”问题。学者们希望能明晰他们的概念,于是开始思考如下问题: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它究竟包括哪些研究内容? Saral 考察了跨文化传播学中的一些定义,注意到它们都包括传播和文化。他的结论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和范围可以有多种理解方式,对文化和传播的不同定义就会得出不同的认识。”但这一结论并不能解决“身份”危机。Prosser 提出研究传播学的四个组成部分(讯息、参与者、语言与非语言编码、渠道或媒体)和文化的四个组成部分(文化演进、文化功能、文化历史和文化生态)。Saral 在 Prossers 划分的基础上梳理出他认为在跨文化传播领域重要的问题,强调理解教育的跨文化层面、跨文化研究中的西方偏见等问

题的重要性,并且 Saral 将道德伦理概念引入这一领域。Smith 和 Rohrlich 通过“我们为什么必须研究跨文化传播?”这一问题将跨文化传播学的“身份”危机带入80年代。由于二人的研究方法不同,所以给出的答案相异。

Smith 认为跨文化传播领域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因为它关注的是人际层面和非语言层面的差异,这一研究方向在 Smith 看来是“非常虚弱、无力、空想的”。他强调从国际层面的问题,如贫穷、战争和国际信息流动不平衡来探讨跨文化传播。Rohrlich 在回应 Smith 的说法时强调 Smith 所说的国际问题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为人际间跨文化问题的重要性作辩护,他认为“跨文化传播永远不可能成为解决世界恶疾的充分条件,但它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即使对于‘仅仅’是人际间的传播来说。”

到80年代早期,跨文化传播趋于成熟。Gudykunst 和 Y. Y. Kim 等学者开始梳理和发展跨文化传播理论,希冀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1976年 Edward Stewart 曾经说:“跨文化传播学建立常规理论、检验、证实假设还不成熟,也许也没有必要。术语得到清晰界定后反而可能会限制发展。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允许松散的理论结构,允许不那么严格的模式、原理和术语。”然而,1983年,Gudykunst 编写了第一本跨文化传播理论著作——《跨文化传播理论》。1989年 Asante 和 Gudykunst 就理论发展问题又写了一本书——《国际和跨文化传播手册》。在本书的第一章,Gudykunst 和 Nishida 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视角作了综述,他们发现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没有单一总括型的理论范式。至少按照库恩的标准,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成熟。理论的建构和验证到90年代还在继续。跨文化传播研究何时达到库恩所说的科学的成熟期还不得而知。但鉴于社会科学的本质,要使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原则规律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成熟科学的第四阶段目前似乎还很难。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文化因素的分析上。虽然在研究过程中有时候对文化交流冲突、文化特性、文化依附和自主等问题有所涉猎,但尤其强调的是对不同文化的行为差异和不同文化的生活习惯的矛盾,以及不同的文化延续发展过程的差异等问题的研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有两种显著变化。一种是从实用问题型研究转向理论问题研究;另一种是从微观研究转向宏观问题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已经涉及到跨文化理论问题和宏观层面的问题。

二、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方法

John Condon 认为跨文化传播有民族志(ethnography)、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公平(equity)三种

研究传统。

(一) 民族志传统。

民族志传统也就是爱德华·霍尔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的语境下对行为进行微观分析。人类学和语言学是影响这一传统的主要学科，研究者不认为文化与传播可以分离。Dell Hymes 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传统。他使用的是归纳研究方法，研究的前提假设是我们因为生活在自身文化的规则中而不了解那些规则，它们处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只有局外人才了解它们，所以通过做调查询问特定文化人群的文化规则，是不切实际的。只有把文化看作塑造我们的外部力量；只有我们去观察特定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听他们阐述他们的所为时，文化载体才能被外部化，客体化。没有统一的语言，语言都是自我表述，语言是在虚构故事。因此，这种研究方法要求做实地研究，并不断对研究对象做跟踪调查；强调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者必须反思，他们的猜测必须通过与被观察者的交流得到检验。在跨文化研究、教学和培训中民族志方法非常受欢迎，因为它比其它方法中立，较少个人情感，因而也更专业。

可以说爱德华·霍尔四十年的研究都是属于民族志传统，然而，无论是做民族志研究还是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任何一项研究，都会出现民族中心主义。偏见、傲慢、假想都存在，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当我们进行描述的时候，总会有一定的民族、种族、语言、政治、经济、性别、年代的立场。所以，如果民族志传统是去“揭示真相”，那么民族中心主义传统揭示的“真相”会让你“怒发冲冠”，而只有公平传统才会让“真相”使你成为“律师或是革命家”。

(二) 民族中心主义传统。

民族中心主义是个普遍的现象，有时候甚至一种文化的存亡就依赖它。它并不一定暗示着好与坏判断，它仅仅表示不同和差异。在民族中心主义中，本族文化的重要性被放大，其它文化的重要性被缩小甚至忽略。极小的差别会被夸大成区分人群的特性。当人们遇到变化、紧张、威胁、不安全时，就会进行自我防卫并以本民族为中心。民族中心主义传统更多地关注群体，即一个群体是如何被认识的，它的成员问题，身份问题，意识问题，空间暗喻，社会距离，中心-外围，边缘性，空间的跨越与缩小，加入与脱离，排除与接纳。其中一种类型的研究就是将局外人视作“他们”，谁有权界定一个人是谁，那他的态度就具有重要性，就能控制意识。后殖民主义就是对民族中心主义问题的研究。后殖民批判理论家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运用了后结构理论家福柯关于知识即权力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对赛义德来说，东方主义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西方人关于东方的东方学（主义），并不是要去达到一个关于什么是东方的带有真理性的知识成果，而是要

通过一种关于东方的言说、书写、知识，以真理的形式去定义一种有利于西方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的出现把后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不仅让人重新认识西方文化，而且也让人重新认识全球现实。西方思想的演进，从近代、现代到后现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中心自我解构的历史。后殖民的理论的大家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西方学院里的名教授，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后裔。赛义德，巴勒斯坦籍；斯皮娃，印度裔；巴巴（Home Bhabha），印度裔；霍尔（Stuart Hall），牙买加裔……这种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双重关怀使后殖民理论显出一种特殊性，它既是西方思想传统的逻辑性继续，又跨出了单纯的西方思想演进，从而为全球性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民族中心主义研究谈论最多的就是对“他者”呈现的批评。批评包括关于如何通过对感知到的和假定的“他者”作民族、种族、阶级和国家的区分从而塑造自我身份的所有的理论研究。Brantlinger 将之称为文化研究必须开设的主要一课：“要了解自身，我们最迫切需要听到的是其它的话语，所有的‘他者’话语。”^[16]斯图亚特·霍尔呼吁文化研究应调动所有的智力资源去探知是什么使得我们这样生活，是什么使我们生活的社会在包容异质差异方面具有深深的反人类特性”。^[17]很多传媒文化研究学者沿着爱德华·赛义德的思路将报刊文章、电视节目或广告等媒体文本作为这种“他者化”的证据。如 Elfriede Fürsich 的《全球新闻工作者如何能呈现“他者”——对于文化研究概念在媒体实践中的一项评估》。

这方面的研究应用包括态度的改变，接触假设，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变更等。当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是，在我们对“他者”的态度和对“他者”的行为表现上其实存在着差距。因此，如果民族中心主义传统通过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展开，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调查中所说出的他们的态度和感受，可能并不能反映出他们的行为表现。

(三) 公平问题传统。

公平问题与公正、正义、剥削、压迫和权力问题相关。在 SIETAR 建立初期，有些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者来自非主导文化和民族，但他们最后离开了这个组织，因为它没有关注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权力、正义和公平。他们认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交流的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力，而事实上，他们这些成员同美国白人的权力并不平等。

公平理论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以下方面的内容：人们如何利用或被他人利用；什么条件下人们寻求公平或被给予公平。例如，当一方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会发怒，而加害一方要么内疚要么彻底否认。当加害一方觉得没有办法弥补他所做的事情，他必定会指责受害者。另一方面，如果有可能弥补他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尽力补偿对方，补救

过失。公平研究不仅针对的是公平问题本身,而且研究特定条件下人们态度转变的可能性。公平研究中还有“公平”与“平等”的区别。“平等”是个大词,它指的是所有方面的相等;而“公平”指的是即使待遇不相等,但各方得到了各自的所需。例如,在日本文化中,婚姻就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有差别的待遇,不同的工作领域;而美国人则强调男性女性在婚姻中各方面的完全对等,他们会比较双方在工作、家务中的劳动量。

公平研究同样与政治科学、经济和哲学相联系。探讨公平问题的主要思想家有卡尔·马克思、弗朗兹·范农、保罗·费莱尔和非白人小说家、女权主义作家。费莱尔在他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中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人性化”与“非人性化”的斗争。这样的想法导引着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人们如何取回本来就是属于他们权力”。^{[9](679)}权力的误用导致整个文化、经济、环境置于毁坏的危机——如不适宜的卫生保健、教育政策、军事扩张及社会福利缩减等等——而走向“非人性化”。跨文化传播目前的问题不是文化的差异,跨文化互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公平问题。跨文化关系中的困难并不总是来自于理解对方非语言讯息的失败。

三、跨文化新闻传播

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中指出信息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的全球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9](621)}在商品的标签下,跨国传媒集团用工业化方式推广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而“消费者权利”成了文化传播的动力。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从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为了国际关系的要素,但文化同时要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体集团所标榜的所谓“现代化的取舍”,虽然看似重视了信息接受者的权利,但却忽视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公平的、互动的、对话的过程。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就认为,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中心,它只是中性地、平等地扩散。^{[5](621)}真正对人们的价值认同产生影响的,是全球化,以及不同国家软实力之间的较量。发达国家借助硬实力的强大,利用全球化,将消费主义文化推广成一种普世价值,消解着穷国的民族文化。这对于穷国的后果实质上是政治的,也是不“公平”的。

单波教授在《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一文中指出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强调的是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基础上的全球新闻传播。这些理念认为,生产和交往的需要,使世界新闻史呈现出某种一致性,无论是把世界新闻史置于西方中心论中考察,还是置于东方中心论中考察,都不会得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真实过程。跨文化新闻传播肯定人类作为具有跨文化经验的物种的可能性,肯定文化的无边

界性以及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鉴于文化的发达与不发达造成的新闻传播落差,或“媒体帝国主义”的出现,跨文化新闻传播推行文化间非垄断化市场原则,多样化的新闻传播空间,从而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交流的论坛。^{[9](679)}

综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民族中心主义传统和公平问题传统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关注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这也同时让人对“本土文化”产生疑问。Rogers, E. M. 和 T. M. Steinfatt 的《跨文化传播》第一章考察了部分文化形成的历史,指出战争、宗教和殖民化过程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文化不可能一定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

跨文化新闻传播在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上如何推行文化间非垄断化市场原则、多样化的新闻传播空间,从而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交流的论坛,这是笔者认为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微观层面研究方面,可以从跨文化新闻传播语言和非语言着手,探讨如何在公平或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话语体系;在宏观层面研究方面,可以结合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探讨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基础上的全球新闻传播。也可以研究在一定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基础上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的普遍性规律,而这些规律的获得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只有通过实证掌握了这些规律,跨文化新闻传播理论才能进入成熟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保证这些理念在具体实践中的实现。

参考书目:

- [1] Brantlinger, Patrick. *Crusoe's Footprints: 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Y: Routledge, 1990.
- [2] Hall, Stuart & Paul Du Ga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Sage Publications, 1996.
- [3] 费莱尔.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4] 马特拉.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 思想与战略的历史[M]. 陈卫星,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5] 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M]. 冯健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6] 单波. 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J]. 湖北大学学报, 2003, (30).

责任编辑 郁之行